

# 试论“黑船来航”事件与日本开国的必然性

王晓露

(成都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 611137)

**摘要:**1853年,美国海军司令佩里率舰队扣关日本,迫使日本仓皇开国并签订条约,结束了长达200年的“闭关锁国”政策。通过对“黑船来航”事件始末、幕府朝廷和有志大名对来航预告情报的动向进行梳理,分析发现日本开国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性。其主要原因在于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外扩张,日本被卷入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可避免;日本幕藩体制的松散性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升级影响了德川幕府统治的权威性和稳定性;面对外来势力日本早有危机意识,“黑船来航”之前具有开国倾向性的言论也已萌芽;日本“边缘”性的传统文化利于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尤其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吸收使得日本知识分子进行了反思与觉醒,催生了冲破封建牢笼的意识。

**关键词:**日本幕末;黑船来航;日本开国

**中图分类号:**K313.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9)02-0055-05

## The Perry Expedition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Japan's Opening-up

WANG Xiaol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Chengdu, Sichuan 611137, China)

**Abstract:** U.S. admiral Matthew Calbraith Perry's naval expedition to Japan in 1853 forced the latter to open up and sign a treaty in a flurry and ended the country's 200-year close-door policy. Th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whole event and the reaction of the Shogun court and motivated daimyos to the warning of the expedi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Japan's opening up looked accidental but actually came as inevitable. The reasons lie in the fact that, in the mid-19th century, capitalist countries were expanding globally and Japan's being involved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market in the making was unavoidable. Japan's loose vassal system and escalation of class conflict at the time damaged the autho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rule of the Tokugawa shogunate. When confronted with external forces, Japanese already had a sense of crisis, and were talking about opening up before the Perry expedition. The "marginality" of traditional Japanese culture is conducive to its absorption of foreign cultures, which would then wake up Japanese intellectuals and induced their ideas of breaking out of the feudal cage.

**Keywords:** Late Tokugawa period; Perry expedition; Japan's opening up

1853年6月3日,美国海军司令官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率领舰队出现在日本江户湾内的浦贺冲。关于这一事件,现在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详说日本史》记载道:“进入19世纪,美国为了推动工业革命,满足太平洋航行船舶与捕鲸船的停靠与物资补给港口,便谋划要求日本开国。1846年,美国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比特鲁前来游说,遭到幕府拒绝。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随着美国西部地区的急速开发,美国越发迫切地感到要求日本开国的必要性。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领四支舰队出现在日本浦贺港,并提交美国总统的国书,要求日本开国。幕府由于没有明确的应对方针,又受到佩里强硬态度的威胁,

只能收下国书,让佩里暂且先离开日本”<sup>[1]220</sup>。除此之外,还介绍了与此事件有名的狂歌:“汽船惊醒太平夜,仅仅四艘,夜不能寐”<sup>[1]219</sup>。总之,对于佩里来航事件,教科书中的一般记述多为幕府和日本民众面对黑船(漆成黑色的美国蒸汽舰船)来航,惊慌失措无计可施的情形,最终佩里用坚船大炮威吓日本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日本方面无力应对,只能狼狈接受,并于1854年被迫开国。

但事实上,早在1852年荷兰商馆馆长方面就传来消息称,美国将于第二年3月率舰队抵达日本。黑船来航预告情报的传达路径和幕府、有志大名等的动向如何,为什么得到了预告情报的日本却仍旧仓皇狼狈开国,以及其为何最终能够成为亚洲最早

摆脱殖民地命运、完成近代化的强国,这些都是日本幕末外交史上值得深思的问题。

## 一、黑船来航预告情报的传达

### (一)日本“锁国”与海外信息获取

1637年日本九州发生了农民起义,也就是所谓的岛原之乱。江户幕府方面对此进行了镇压并对参与人员进行了调查,发现多为天主教徒。为了杜绝天主教在日本国内的蔓延,江户幕府决定禁止国外船只进入日本,禁止日本人的海外出行,同时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和贸易。这一系列的对外政策就是所谓的“锁国令”。实际上,幕府施行锁国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防止西方势力对日本的入侵,维护专制的幕藩体制和德川幕府的统治地位。

但锁国中的日本也并非完全处于孤立,不问国际形势。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后,来自西方各国的外压愈发强势,于日本而言,收集海外信息对其制定本国内政外交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幕府收集海外情报的手段之一是漂流民,幕府从偶然漂流到日本的外国人和归国漂流民处收集海外各国的信息。幕府方面甚至会强制性地要求漂流民提供海外情报,并禁止漂流民公开情报以达到独占情报的目的。幕末时期德川幕府编辑的《通航一览》中记载了许多与漂流民相关的史料。此外,江户幕府对外国设置了“四个关口”,即长崎口、萨摩口、对马口、松前口,与朝鲜、琉球保持“通信”关系,和中国、荷兰保持“通商”关系<sup>[24]2</sup>。幕府会在长崎关口定期停靠的中国、荷兰商船处获取风说书,包括《唐船风说书》《荷兰风说书》《别段风说书》。这些风说书经翻译、整理后呈递幕府,成为“锁国”体制下幕府了解海外的主要情报来源和制定外交政策的参考。

### (二)“黑船来航”预告的传达与幕府的保密主义

对于开国前夜的日本而言,黑船来航的海外预报消息无疑是重大且机密的。早在1852年7月,当时新上任的荷兰对日贸易商馆馆长亨德里克曾向长崎奉行转交了《别段风说书》,其中便记载了关于佩里将于第二年来航的情报。长崎方面相较以往以更快的速度将这封风说书翻译成日语并送往江户幕府。风说书阐明:有消息称美方意欲与日本缔结条约,并会向日本派遣9艘军舰,其中包括进驻中国的5艘军舰和佩里所率另外4艘军舰。此外,舰队上还会搭载陆战士兵和作战兵器,出发时间在4月下旬<sup>[23]7</sup>。

亨德里克除了转交风说书外,还试图转交一封由荷兰东印度总督写给长崎奉行的书简。但因为

荷兰只是“通商国”的关系,与“通商国”通信是有违祖法的,长崎奉行并不敢断然接受。亨德里克强调这是关乎日本切身利益的大事件,他本人甚至愿意上京向幕府禀明此事。于是长崎奉行破例向老中阿部正弘就书简接收一事进行请示,直到阿部正弘指示将此书简当作风说书同等处理,日本幕府才于8月末接受了荷兰东印度总督的书简<sup>[4]327-344</sup>。这封书简则更为详尽地说明了美国现今的强大国力和其派遣而来的军事力量。荷兰方面认为这对于日本而言是极大的威胁,如若日本与美国兵戎相见,将不免陷入一场灾难性的血战,故而奉劝日本放弃锁国政策,同时也提出了荷兰希望与日签订通商条约,开通两国互市的意向<sup>[5]26-30</sup>。

这封来自东印度总督的书简,实际上也是美国政府在打算向日本派遣使节之际,向荷兰政府提出希望得到一定协助的结果。荷兰政府指示新任商馆馆长积极游说日本方面放弃锁国政策,并把这样的指示通告了美国。所以,当佩里第一次出现在浦贺港时,在美国的认知里日本幕府已经在一年前接到了自己来航的预报。然而幕府并没有将荷兰商馆馆长带来的《别段风说书》和东印度总督的书简看作美国与荷兰进行官方接触后所提交的文书,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其重要性。

幕府在得到黑船来航的预告消息之后,对长崎方面实行了极其严格的封口令,对翻译所进行隔离,翻译草稿等文件一律禁止带出翻译所。而在幕府内部,阿部正弘将风说书与书简下发至海防部门让其进行评议。海防部门从10月初便开始针对这一预告信息进行分析,但迟迟没有结果。焦虑万分的阿部正弘先于10月22日左右将这一消息口头泄露给了岛津齐彬(萨摩藩藩主——笔者注)。同年11月28日,向负责长崎警备的福冈藩主黑田齐溥、佐贺藩主锅岛齐正内部传达了记载黑船来航预告消息的别段风说书。年末又向负责江户湾警备的会津、彦根、川越、忍四藩藩主和浦贺奉行也传达了消息,并附言切不可走漏风声,对有志大名和御三家则采取了隐瞒态度<sup>[16]502-504</sup>。

可见,幕府对黑船来航的消息采取了保密主义政策。在当时情况下,日本想要在海防计划上取得巨大进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公开消息或展开大规模的警备措施必定会受到各大名的干涉,并引起国民的恐慌,这对于幕府自主决定应对策略和维持既有的锁国体制都非常不利。因此,幕府仅仅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了与江户湾防卫直接相关的人员。

## 二、有志大名与幕府的动向

### (一)引起重视的有志大名

虽然幕府对这一消息进行了封锁,但通过大名间的信息互通、阿部正弘的内部传达等多种途径,一部分大名已经掌握了黑船来航的消息。虽然幕府的态度比较迟钝,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消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一部分大名却并未掉以轻心。

前文提到为以防万一,阿部正弘先是于10月22日左右将这一消息口头泄露给了岛津齐彬,并于11月28日向黑田齐溥、锅岛齐正、岛津齐彬通过内部传达的方式传达了这一信息,催促他们针对这一预告提出相应对策。事实上,尽管幕府费尽心思隐瞒,但这一重要情报早就被泄露了。长崎的萨摩藩武士大迫源七从当时的翻译手中得到了一份《别段风说书》中关于黑船来航预告消息的内容。而早在阿部正弘之前,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于7月就已得到这一消息,但他并未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在10月收到阿部正弘的口头传达后才将这一消息秘密传达给了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尾张藩主德川庆胜、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

得到消息的福井藩主松平庆永和岛津齐彬试图通过向大名们传达佩里来航情报,聚集大名之力向阿部正弘施压,推动幕府海防部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而众大名中间也兴起了向幕府进言的风潮,松平庆永曾自述到“嘉永子年春起,来丑年明国公使来航之事已有评判。荷兰也已向幕府谏言。余对此深感忧虑,屡次向阿部伊势守等谏言”<sup>[7]281</sup>。1852年末福冈藩主黑田齐溥向幕府呈递“对外建策书”,提出了公开海外情报、联合御三家共商对策、强化浦贺海防、建造蒸汽船等具体建议。1853年初黑田齐溥向幕府呈递了意见书,试图让幕府认识到浦贺警备的脆弱性,唯有建造蒸汽船才能与美国的蒸汽船抗衡,但因其对幕府大加批评,且言辞过于激烈,遭到了幕府的否决。此外,还有大名也根据情报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如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就设想,如果黑船来航那么日本有可能不得不与美国展开正面军事交锋,这样一来处于品川附近萨摩藩的江户显然不是合适的避难所。因此,岛津开始向内陆的山手方面购入房屋,并于1853年1月成功入手涉谷府邸。总之,当时的有志大名积极收集黑船来航的情报,并认识到了情报的重要性,纷纷向幕府建言献策,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 (二)迟钝麻木的日本幕府

幕府内部在得到黑船来航的消息之后,于1852

年10月初着手对此进行分析,老中阿部正弘向海防部门征询意见。直到10月24日海防部勘定奉行等人才回复称无法辨别情报真伪,提出召回长崎奉行回江户以进一步确认。11月长崎奉行奉命抵达江户,呈上奏书称“荷兰商馆馆长贪得无厌,妄图渔翁得利”。因此,海防部根据这份奏书轻易地认定黑船来航情报为虚假情报。尤其在江户湾防备的关键浦贺奉行所内部有关佩里来航预告的关注点都放在了美国所要求的开国仅仅是希望日本为其提供一个储藏煤炭的场所<sup>[8]230</sup>。浦贺奉行在长崎奉行的奏书与海防部否定了消息真实性的基础上,向下放出消息以平息传闻。到了1852年2月,虽然浦贺奉行所内也偶有人进言称离预告佩里来航的时间愈来愈近,应该加强浦贺港口的警备,但高层官员根本不予理会,只回复说“不管来多少异国船只,只要日本以铁炮反击,应该就会速速离去”,“浦贺乃日本门户,是幕府内海咽喉之地,不作应对外国事务之地。若有来航船只应坚决抵制,让其绕至长崎港口即可”<sup>[9]18-52</sup>等等。他们认为如若允许美国通商,也必须要同意俄英法的通商要求,这是万万不能允许的,必要时刻只能以战争解决。当时幕府官僚中“到时候用威严气势即可逼退外国人”这样的意见占了主导。如此一来,更加难以继续商讨有效对应策略。老中阿部正弘焦急万分,却苦于被朝廷重臣们的意见所缚,一度陷入窘境,但他坚持应当着手加强海防,于是拟定了搭建炮台和建造军舰的计划。然而,5月江户城西丸区的宫殿再建工程发生火灾,幕府陷入财政困难,阿部正弘的海防强化计划无法推进,最终只能建造2艘军舰,难以打开局面。加之到了第二年4月,黑船的身影也没有出现,幕府内部更加笃定此项预告情报根本是子虚乌有,不必杞人忧天。

6月佩里率领的军舰出现在江户湾浦贺港口,并带来了美国总统的国书,负责交涉的浦贺奉行支配与力香山荣右卫门要求美方回航长崎,但与幕府所设想的情况不同,佩里的姿态相当强硬,香山荣右卫门曾痛哭回忆:“如若能提前确定情报的真实性,对应便不会滞后了”<sup>[9]18-52</sup>。此时接受美国国书只是时间问题,美国限期日本3日内给出答复。阿部正弘和幕府官僚们焦头烂额,向水户藩主德川齐昭询问对策,但是一无所获。事态紧急,幕府顾不得保密主义,命各界人士上朝献计献策,却也无疾而终。最终阿部正弘决定接受美国国书,令其早日离开,之后再听取各方意见决定国家层面上的应对方针。总之,日本对佩里来航情报并未讨论出有效

应对措施,招致了一味屈服于美国的结果。

其后幕府第12代将军德川嘉庆逝世。得知消息的佩里觉得此时正是趁乱出击的好机会,1854年2月佩里比约定日期早了将近半年再次来航日本。经过1个月的交涉,双方于3月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5月又签署了《条约附录》。条约规定日本需向美国船只提供补给物资、优待漂流民和来航人员,并开放下田、箱馆两个港口<sup>[10]450-473</sup>。以此为开端,日本又陆续与俄国、英国、荷兰签订了内容几乎相同的条约,朝资本主义世界敞开的日本大门自此越敞越大。

### 三、日本开国的必然性

佩里来航事件看似突如其来,迫使日本幕府在不能商讨出相应对策的情况下仓皇打开国门,但顺应开国的日本却也避免了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半殖民地的命运,并随后开展了“明治维新”运动,走上了全盘西化与近代化发展道路。日本开国看似偶然,实则其历史必然性。

#### (一) 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扩张

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不断发展,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市场,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东渐”,对亚洲各国进行侵略蚕食,迫使这些国家沦为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印度和中国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俄国也不断向西伯利亚扩展自己的势力。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依然维持“锁国”的日本显然违背了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建立全球自由市场的战略目标。

1848年美国出现“淘金热”,大量移民流入太平洋沿岸。除了推动本国纺织业和给捕鲸船提供补给的目的,为了发展西海岸据点和开拓太平洋航路,美国更是有意将日本作为进驻中国市场的中转站,开发中国和日本市场以形成自由贸易圈。没有获得殖民地的美国相较于进驻清国的英法荷等国感觉到了自身的滞后性,因此把目光投向了还未受到关注的日本。实际上,在1764年到1854年之间,俄国、英国、法国都曾尝试扣关日本,但均被日本以违背闭关锁国的“祖法”为由所斥退。加上当时中国才是资本主义各国觊觎的主要市场,尤其1842年8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战后处理事务繁多,俄国也将注意力放在西伯利亚方面,这就使得美国有机可乘。佩里对过去各国扣关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决定采取强硬手段,最终因双方军事力量悬殊过大,日本方面未商议出应对措施,只得被迫打开国门。

#### (二) 日本幕藩体制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凸显

日本江户时代的政治体制不同于中国的中央集权制,而是“双重二元政策体制”,是一种以拥戴天皇为统治象征,德川家族为统治盟主的“双首体制”。有200多个大名与德川幕府存在隶属关系。但他们的关系并不是非常紧密的,而是一种松散的关系,大名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相应的独立权,相当于200多个小国家。德川幕府并没有绝对的保障,而是需要通过调动大名履行军事、劳役义务来维持和巩固幕藩体制。尤其在黑船来航前,幕府对大名的管制有松懈的趋势,德川家族内部的联合也在弱化。这样一种松散的二元“双首体制”相对中国完善正统的中央集权制而言在面对外来危机时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同时也更容易瓦解。

此外,19世纪中期,不同于中国各阶层的知识分子、有志之士可以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制,日本以血统制和世袭制为基础的官僚体制和身份限制导致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下层武士对现行统治秩序存在强烈否定态度。<sup>[11]</sup>日本的知识分子中不乏有人掌握了全面的知识,但真正的权利都掌握在贵族和大名手中,碍于身份他们的谏言往往不被统治阶层采纳,就连一些上层大名也处于这样一种状况。无法进入权力中枢使得他们难以公开发表批判性的意见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在江户末年诸多有志大名和知识分子渴望改变顽固不化的幕府统治,他们甚至将西方力量的东渐看作一种机遇,希望以此为契机刺激幕府整顿军备、加强海防、推动改革。

#### (三) 危机意识的出现与开国倾向性的萌芽

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处于“锁国”状态之下,但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学习却没有由此而止步。幕府于19世纪前期加强“锁国”力度并不是因为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相反正是意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征服世界的企图和其日渐壮大的国力与军事力量的结果。面对遥远而不知何时到来,无法预测的危机,当时掌权的幕府官僚并不认为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故而采取加强锁国的政策来保证当政期间的太平。但一部分大名和知识分子积极地搜集海外信息,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幕府极秘的风说书复本和其他关于外国的书籍,了解到欧洲各国出现和平局面,英、俄将触角伸向中国的消息。尤其《荷兰风说书》《唐风说书》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国惨败,被迫割让领土、巨额赔款的事实更是震撼了日本,使得日本政府切实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不可小觑。当时的老中水也忠邦

对国外形势抱有危机感,认为这一事件应作为前车之鉴,因此于1842年8月下令撤销“异国船只击退令”,改为“薪水给与令”,对锁国政策进行了调整<sup>[1]</sup>。尽管幕府权力中枢感到了威胁,但为了维护幕藩体制还是坚持固守“祖法”,不愿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黑船来航之前已经有一部分有志之士开始对日本海防和“锁国”政策产生了质疑。其中林子平于1791年发表《海国兵谈》一书,认为日本海防薄弱,强调日本既然为海国就应严备海防。本多利明在其1798年发表的代表作《经世秘策》中提出日本既作为海国,渡海、运送、交易自不必说,还应向他国遣派船只获取补充国费必需的产品和金银铜以增强日本国力。近视中期志筑忠雄翻译科佩尔《锁国论》的一部分到日本,认为日本闭关锁国是有违发展规律的<sup>[2][11-12]</sup>。此书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一度被幕府所禁,但依然激起了有志之士对于“锁国”体制的反思与批判。1839年,渡边华山因发表《慎机论》主张开国,批判幕府政策,其本人和小组成员遭到幕府镇压,这就是著名的“蛮柱之狱事件”<sup>[12][309-310]</sup>。

对西方各国形势的情报掌握、对西方国家入侵日本的危机感以及开国倾向性言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使日本政府认清了自己与西方各国实力上的绝对差距,奠定了日本避战开国决策的基础,使幕府末期在面对佩里来航危机时放弃抵抗转向“开国”,从而使日本避免了像当时的大清帝国一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保持了国家的独立。

#### (四)“边缘”性的传统文化利于外来文化吸收

在秦汉以后,中国率先进入高发展阶段封建社会,其文化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远地区,构成

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日本处于文化圈的“边缘”。<sup>[13]</sup>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根基深厚、历史悠久的原生文化具有很明显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固有的“文化定势”使其难以轻易接纳外来文化。相对而言,日本作为一个文化边缘的国家,作为次生的弱势文化,其转型则相对容易。从吸收汉唐文化到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有别于中国机械的“拿来主义”,“中体西用”,日本外来文化尤其是对西学的摄取不仅停留在科学技术方面,还积极吸收与取舍西方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等。黑船来航之前,关于西方自然科学的书籍在日本已广为流传,自然科技文明的引进促进了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的发展,同时也扩大到了人文科学的领域,使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人文主义思想和自我意识,催生了冲破封建牢笼的可能性。安藤益昌、司马江汉、渡边华山等一批西学者对幕藩体制的弊端进行了指责,包括后来出现的“倒幕”、“攘夷”、“开国”等冲突都是源于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所带来的反思与觉醒。日本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特质令其在开国以后能够迅速走上改革维新之路,开启了文明开化和近代化进程。

“黑船来航”事件无疑是日本开国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使日本结束了长达200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佩里用野蛮的方式强迫日本打开了国门,可日本人却把他视为英雄。明治维新后,时任首相伊藤博文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树立在当年佩里登陆的地方。为纪念佩里,日本还在横须贺市修建了一座佩里公园,每年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黑船祭”,“黑船来航”事件在日本历史上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 参考文献:

- [1] 木村靖二,岸本美绪,小松久男.详说日本史[M].东京:山川出版社,2017.
- [2] 三谷博.ペリ一来航[M].东京:吉川弘文馆,2003.
- [3] 松本三之介.胜海舟全集[M].东京:劲草书房,1892.
- [4] 维新史学会.幕末维新外交史料集成[M].东京:第一书房,1978.
- [5] 岩下哲典,真荣平房昭.近世日本の海外情报[M].东京:岩田书院,2001.
- [6]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大日本维新史料[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
- [7] 芦田伊人.松平春嶽全集[M].东京:三秀舍,1942.
- [8] 松平家.前桥藩松平家记录[M].东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1977.
- [9]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大日本古文书·幕末外国关系文书1[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
- [10] 田保桥浩.近代日本外国关系史[M].东京:刀江书院,1943.
- [11] 冯天瑜.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605-611.
- [12] 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13] 王铁桥.关于日本文化的世界定位问题[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4):84-88.